

赫尔墨斯国际前沿论文书系

麦克卢汉与媒介生态学

[美] 兰斯·斯特拉特 著
胡菊兰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麦克卢汉与媒介生态学

[美] 兰斯·斯特拉特 著

胡菊兰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克卢汉与媒介生态学/(美) 兰斯·斯特拉特著;胡菊兰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 11
(赫尔墨斯国际前沿论文书系)
ISBN 978-7-5649-2474-4

I. ①麦… II. ①兰… ②胡… III. ①传播媒介—文化研究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9068 号

责任编辑 谌洪波

责任校对 靳宇峰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32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本书为国家高端外国专家项目(文教类)
“媒介生态学与当代中国传播学建设”(GDW20164100040)成果

赫尔墨斯国际前沿论文书系

主 编 汝 信

副主编 金惠敏

策 划 张云鹏



总 序

马克思曾批评旧哲学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不知道更重要的工作乃是“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实践性品格而著称。

孔夫子的解释学亦侧重于学以致“用”的方面，例如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显然，对他而言读诗的最高境界不在诗内而在诗外。

当代西方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描述说：如今人文知识分子已从过去的“立法者”蜕变为“解释者”。鲍曼将前者视为现代性，后者为后现代性。其价值倾向，这里不去究问。

因此，当我们将丛书定名为“赫尔墨斯”云云是否便意味着一个消极的和保守的计划呢？

赫尔墨斯，源出于古希腊神话，在他的诸多职能中，以作为神的信使最著名，因而“解释学”(hermeneutics)就是由他而来的。“在所有西方语言中，赫尔墨斯词源意味着：表达和辩术、转译和解释。”(贝尔纳·斯蒂格勒)

但是，我们所理解的“赫尔墨斯”却并不仅仅是“解释”，或仅仅局限于不及物的“认识”。解释学有待于重新解释。

第一，“解释”本身其实就孕育着“改变”的种子。我们何以要解释？“解释”不是解释行为的目的。“解释”是去蔽，是揭开隐藏的真理，是神话中所谓的“传达神的旨意”。对世界的“改变”当依赖于先于对它的“解释”或“认识”，因为毫无疑问，人是理性的动物。“解释”总是为“改变”构筑蓝图。“改变”自然也会反过来确认和修正“解释”。

第二，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其本职工作在于“解释”，在于为最终的“改变世界”提供合乎真理的知识。一个人文学者固然可以带着他的知识去从事其他职业，去做觉醒了的浮士德，但他将不再是学者了。学者以学术为业，以学术向世界说话。在他，“言”即是“行”，言行不二，以言行事。

因而我们的“赫尔墨斯”代表着坚守学术本位而又积极进取的入世态度。“解释世界”意在“改变世界”，或者说，“改变世界”先已内在于而不是拘禁于“解释世界”。

进入新世纪，我们是愈益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力量的冲击和挑战。《共产党宣言》所期待的“世界文学”虽未实现，远未实现，

但已在缓缓地向我们逼近了。而倘若把“世界文学”视为一个过程,那么它实际上早已开始。全球化是一种变革性的力量,生活在变,知识在变,一切传统的东西都在经历着某种转型。

全球化对学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超越民族之“片面性和局限性”的“世界文学”视野,要求解决世界共同问题的勇气和能力。我们无权选择“国际性”,就像我们无权选择事实一样。“国内学术界”正在汇入“国际学术界”。“国际性”已表现为当前学术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被裹挟于其中。我们只能向“国际前沿”走去。否则,便不得不接受被边缘化的命运。

丛书提出一个“论文书”的概念,是有针对性的。近些年,形式上的“厚”“重”“大”书很受追捧,而一些很有学术分量的论文却难以找到恰当的方式面世:杂志嫌它长,出版社嫌它短,科研管理部门嫌它是“论文(集)”而不是“专著”。异乎此,我们则坚信,要发展学术,首要的是从一篇篇的论文做起,然后庶可形成真正的大书。

设立在百年老校河南大学的“河南省高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自建立之日起就以开放的姿态和视界开展学术活动、组织学术研究,近年来在海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现在,中心主任张云鹏教授出于对学术发展大势的把握,以前瞻性的目光,又将这套以“赫尔墨斯”为宗旨的丛书列入中心的工作日程。丛书有了“家”,有了“温暖”,但也更有了不容懈怠的“责任”。我们组织者个人能力有限,惟望得到海内外学人的不吝支持。学术是大

4 麦克卢汉与媒介生态学

家的事业,远的说,也是全人类的事业。

我们不敢对丛书做过高的期许,但我们会以较高的标准要求丛书,以敬畏之心对待我们的学术事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是为序。

汝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河南省高
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学术委
员会主任

2008年3月4日

序 言

能将拙集译译为汉语,并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付梓刊行,对我而言,既为愉悦之事,亦深感荣幸之至。作为一名学者,当我得知在世界的另一端,一个在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里,况且这个国家的文化与我所处的文化氛围有着显著的差异,竟然有人对拙著感兴趣,我的心中便油然而生一种喜悦之情。而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能有机会与对你的观点感兴趣的人发生联系,与他们交流知识,沟通思想,并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影响他们的思想与内心,这难道不是最高之荣誉吗?我想,幸好有了这本书的出版,否则的话,我的文本和话语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读到。

在此,请允许我补充说明,我并不认为,能赢得这样的荣誉完全是缘于我自己的功劳。确切地说,是我有幸,引用一句名言来说,就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之上”(在英国人中,这一名言很多时候与艾萨克·牛顿联系在一起,虽然在他之前已经被广泛使用)。

2 麦克卢汉与媒介生态学

拙著所要表达和解说的，是一种在 20 世纪得到极大整合的知识传统，这主要是在讲英语的区域，尤其是在北美。但是，这也是一种植根于古老文明世界的知识传统，在禁止使用视觉图像的以色列先知中，在探讨口语表达与书面文字差异的古希腊哲学家中，皆有所述。尼尔·波兹曼，我的导师，把这一领域命名为“媒介生态学”。

在媒介生态学领域中，最著名而且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就是马歇尔·麦克卢汉，他的著作展示了首次把多种不同领域的研究，诸如传播、文化、语言、符号、文学、艺术、建筑、技术、信息、系统，如此等等还有很多内容，都糅合起来的伟大综合。麦克卢汉的深刻洞见标志着 20 世纪最重要的一次知识突破，而且我很乐于能够付出自己的绵薄之力，把他的研究带给那些对其不了解的人。如果这本论集能够引导读者阅读更多麦克卢汉本人的著作，那么，此书的出版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当然，虽然麦克卢汉是这本书的中心，但是我要强调，媒介生态学领域不仅仅局限于麦克卢汉，其内容庞杂广泛。而且，有大批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人数之多，如果不把序言变成参考书目，是无法一一列举的，的确，他们对该领域都很重要。随着对本书的阅读，你会发现，我在开始之处聚焦于麦克卢汉，转而逐步对媒介生态学领域进行更宽广的考察。另外，本书不是单纯地只关注使其成为媒介生态学学者的任何某一单一的学科，如媒介、语言、传播、文化、技术等。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共享的感觉、一种视角、一种途径，即思考事物的方法。我认为，它就是与中国道家思想相关的概念“道”(way)，而且我相信，读者会在媒介生态学与道家学说之间找到很多共同之处。

在我的理解中,媒介生态学所涉及的就是方法,但是,该方法不是在科学的意义上,而是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提出如何(how)所引出的问题。其所涉及的除了“谁”、“什么”、“什么地点”、“什么时间”,或者“为什么”等问题之外,还与“我们如何做事之问题(即做事之方法问题)”及“我们结束在做的事”,或者“从一开始就不做事”,以及“我们最终以什么而宣告结束”、“我们在什么时间做我们做的事”等,有着最大关系。另外,与“我们是谁”或者“在采用我们做事的方法做事时我们成为谁”之类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关系。我认为,这才是媒介生态学方法的本质,这种方法在哲学上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北美的一种知识传统。

作为一位媒介生态学学者,我不禁要对这本书的读者感到惊奇!毕竟读者们阅读的不是我的原文文字,而是对拙作的一种逐译,而翻译绝不可能与原文文字一模一样。有一句意大利语格言谓之“traduttore, traditore”,就是“译者即叛徒”。这有趣地传达了一个事实,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其译文绝不可能与原文完全一样。例如,在这一格言的翻译中,意大利语中两个单词发声上的相似就减弱了,即便在英语中没有完全消失,它也因此而不再是一句有幽默感的双关语了。我不知道怎么把它译成中文。说翻译中总会有东西丢失,又让人有些老生常谈的感觉,但是,值得说的是译文中也会有其所得,即会出现原文本中不曾有的东西。构成媒介生态学领域的思想线索之一,有时被认为是语言相对论,即不同的语言代表着不同的表达、理解和看世界的方法,构成不同的思维工具。

作为一位媒介生态学学者,我也对把拙著从字母文字系统转

变成代表汉语的语标文字系统的翻译过程感到惊奇。如果语言是一种媒介,著作则是另一种,因此书面文字代表媒介中的媒介。在这层意义上,我的原著被双重地从你面前的这本成书中删除了,而且你解码书面文字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同于阅读字母文本的过程。就如不同的语言一样,不同的书写体系也充当不同的思维工具以及对世界不同的理解方式。此外,我假设你正在阅读的是一本印刷体图书,我想知道它是否是电子媒介的,因为电子媒介会进一步改变我传达的信息以及你所理解的意义。

作为一名媒介生态学学者,我也不禁想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时间内阅读这本书。即便我们能分享相同的语言和书写系统,若书面语言在空间和时间中施加距离,那么这一距离也是不利于读者全面理解作者极力要传递的内容的,这就是为何柏拉图要让苏格拉底把书面文字批评为没有人情味的、反应迟钝的东西,一种不会对所提问题进行应答的呆板的东西,一条并非以其原意而走近读者、使读者完全有可能产生误解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流逝,理解上的困难只会增加。从我写这些文字到你阅读这些文字,这之间已经过去多长时间?我怎么有可能知道,你们,我的读者,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未来世界?

我还应该补充一点,作为一名传播学者,我清楚地知道,即便在最好的环境下,甚至我们的交流媒介是面对面的对话,而所发出的信息,也绝非恰好就是所能接收的信息。作为一名媒介生态学学者,我意识到媒介(技术、技巧、物质与方法、语言、编码、形式、情况、语境、关系等)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意义,作为纯粹的主观现象,则存在于个人、发送者、接受者、交流者的心中。而媒介作为我们自身的一种客观性外化,用麦克卢汉的话说,则是我们

自身的一种外延,它存在于我们的外部,构成我们自身所生存的环境。

我所说的这一切,是想表明,我对各位读者对拙作内容所理解的意义是多么的没有把握,对你所理解的意义是否与我试图要传达的意义是否一致,又是多么的没有把握!尽管如此,该书仍然表明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虽然有一些距离,但是终究是我与作为读者的您之间的联系。就我们分享共同的人类生活和人类意识体验而言,我们可以依赖充分的共同之处,从而使交流成为可能,创造出共享的意义,使我的文字与您产生共鸣。正如一个音叉(tuning fork),当敲下去时,产生振动,这一振动可能在第二个音叉上引起共振。

另外,作为一位教育工作者,我的目标不是把我的思想完全复制给他者(别人),准确地说,应该是为他者引导一种思维过程,提供一种思维工具,使得他者用新的途径观察、理解世界,开放思想,帮助他人进行独立思考。如果我的想法,正如我书中所传递的,能够激励你产生新的深刻见解与观点,那么,这本书已经是很成功的了。

在对翻译问题做了详细说明之后,我想借此机会对胡菊兰教授道声谢谢!她为我论文的翻译付出了巨大的辛劳。我知道翻译是艰难的,我为能得到胡教授所给予的关注与辛勤的付出,而深感荣幸,在此我要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之情!为此书的出版,我还要感谢金惠敏教授以及他所给予我的友谊。另外,我还要答谢易晓明、周敏和李勇等诸位教授。

本书是一本以前从未以此种形式出版过的初版论文集。但是,在此我还想提一下单个章节的由来。《媒介生态学与麦克卢

汉的遗赠》是专门为中文翻译所写,最初于2012年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媒介与麦克卢汉讯息》是为西班牙语翻译所写,并于2012年发表于《美国信息—伊比利亚美洲传播评论》(*Infoamérica - Ibero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view*),同年又发表于*Razón y Palabra*。在其前一年,即2011年,是马歇尔·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这一年世界上举行了种种百年纪念大会以及其他纪念活动,学术期刊上刊载了纪念专题,在大众媒体和网络上有许多报道和特辑。本论文集的第二篇文章就是为此庆祝活动而写。第三篇文章最初收录于科里·安东(Corey Anton)与我共同编辑的文集《科尔兹布斯基与麦克卢汉》(*Korzybski And McLuhan*),该书于2012年由普通语义学协会在美国出版,这篇文章再次出现于由迪帕·米希拉编辑的《普通语义学:批评指南》(*General Semantics: A Critical Companion*)一书中,该书于2014年由书法国际(*Pencraft International*)出版社在印度出版。《引出原因的结果与引导模式》是为另一部文集撰写《开启麦克卢汉原因:正式因果关系的视角》(*Taking Up McLuhan's Cause: Perspectives on Formal Causality*)的一个章节,该书由罗伯特·K.洛根(Robert·K. Logan)、科里·安东和我主编,并将于2016年末或2017年初出版。《麦克卢汉与新媒介》这篇文章也是为纪念麦克卢汉所写,并于2012年在拉丁美洲期刊《拉丁美洲传播学杂志》(*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Ciencias de la Comunicación*)上以英文发表。

《数电子羊:在媒介生态学语境中理解信息》最初于2012年发表于《信息》杂志的一期专刊,专刊名是《信息:其不同模式以及其与意义的关系》。《国家的衰落:新媒介环境中社会体系的命

运》一文最初于 2011 年以英文发表,随后葡萄牙语译本在巴西杂志《电子转盘》(*E-Compós*)上刊行。《论时间偏向》是我的著作《时间偏向论及普通语义学和媒介生态学论文集》(*On the Binding Biases of Time and Other Essays on General Semantics and Media Ecology*)的标题论文,该书于 2011 年由普通语义学协会在美国出版,其早期版本于 2010 年发表于杂志《ETC: 普通语义学评论》(*ETC. : A Review of General Semantics*)和《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英雄与/作为传播》这篇文章,最初刊载于由苏珊·德鲁克(Susan Drucker)和加里·冈伯特(Gary Gumpert)主编的文集《全球世界上的英雄》(*Heroes in a Global World*),该书于 2008 年在美国由汉普顿出版社出版。《毒品:人性的内涵》最初刊载于文集《毒品与媒介:对传播、消费和意识的新视角》(*Drugs and Media: New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Consumption and Consciousness*),由罗伯特·C. 麦克杜格尔(Robert C. MacDougall)主编,于 2011 年由 *Continuum* 在美国出版。最后,《自恋与模仿言语:感觉与为自我而挣扎》(*Narcissism and Echolalia: Sense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Self*)这篇文章最初是作为我的专著《反响与省思:论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媒介生态学》一书的第二部分出版的,该书由汉普顿出版社于 2006 年出版,其早期版本于 2003 年发表于《ETC: 普通语义学评论》,2000 年发表于《话语传播年刊》。另外,在中文杂志上先期刊发的还有《中国图书评论》2014 年第 11 期的《麦克卢汉与新媒介》,《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2 期的《科尔兹布斯基与麦克卢汉》,《东岳论丛》2015 年第 6 期的《国家的衰落:新媒介环境中社会体系的命运》,《上海大学学报》2016

年第6期的《英雄与/作为传播》等。

由于本书中的11个章节最初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撰写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它们相互间有一些重复和冗余,因为我介绍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其他学者以及媒介生态学时,是将其作为一个领域和视角,我希望这不会使读者生厌。您或许会察觉到,在每一个实例中,您似乎在从不同的角度接触相同的材料,发现具有意义的方面和重要的衔接,从而发现这是一种有益的回顾形式。我已经给文章编排顺序,我相信这一顺序是最适合读者阅读的,读者可以一种直线性方式进行阅读,从开始到中间再到末尾。作为一本论文集,读者当然也可以按照自己需要的顺序进行阅读,不用有任何失去连贯性的担心。

最后,让我以感谢和希望来结束该序言。感谢您拨冗阅读这些作为序言的评述,同时,我真诚地希望您在该书中能够发现一些对您自己、对您思考人类社会具有价值的论题。

作者